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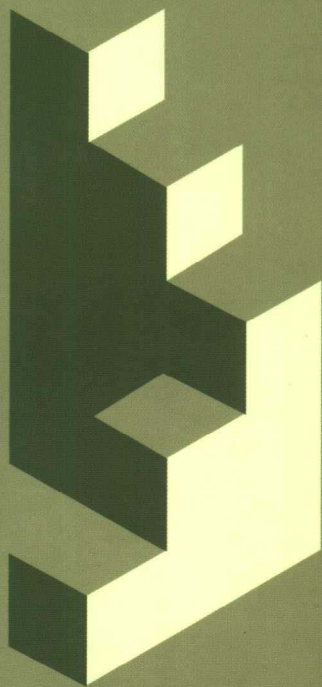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he Formation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Effects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 ——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

石毓智◎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he Formation of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Effects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

——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
吕毓智 著

藏书章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 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石毓智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

(中青年语言学者文丛)

ISBN 7-5619-1127-0

I. 现…

II. 石…

III. 汉语-动补-研究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466 号

责任编辑

出版社

网

印

经

版

开

字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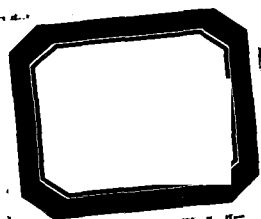
定

价

发

行

E-mail



5 号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om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数: 256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号: ISBN 7-5619-1127-0/H·02116

价: 24.00 元

发行部电话: 010-82303651 82303591

传真: 010-82303081

E-mail: fxb@blcu.edu.cn

内 容 提 要

本书应用语法化理论探讨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建立的动因和过程。汉语语法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期是10至15世纪,几乎全部的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法特征都是在这个期间产生或者发展成熟的,主要包括:体标记系统的建立、动词重叠式的出现、动补结构的发展成熟、“把”字句的繁荣、新话题结构的形成、动词拷贝结构的萌芽、谓语结构的有界化、时间词和介词短语的重新分布、连动式第一动词的大批语法化、新比较格式的产生、量词系统的建立、助词“的”的语法化、复数标记“们”的出现,等等。语法的发展总是由新形式的产生和旧形式的消亡两方面构成的,它们一起改变一个语言语法系统的整体面貌。在这个时期也消失了很多古汉语的重要语法形式,主要包括:可分离式动补组合、屈折使成式、多动共宾结构、各种各样的谓词并列结构、施事和受事的语序区别法等。本书尝试解释,为什么这一系列语法变化会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我们认为它们的发展不是毫不相干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由一种基本变化——动补结构的建立——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的结果。本书抓住动补结构发展这条主线,描写和解释各种有关的语法现象产生的动因和过程。动补结构的发展实际上是由原来独立的两个句法单位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的过程。这一变化带来了深刻的句法结果,最直接的影响是动词语法范畴的大量涌现,比如体标记“了”、“着”、“过”和情态助词“得”都是直接从补语的小类发展而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影响是,由于“动”和“补”融合成一个句法单位,不再允许动词的受事名词插入其中,对受事名词的重新安排又引起了一连串的句法结构变化,比如“把”字句、动词拷贝结构和新话题结构都是因应名词受事的重新安排

的结果。不仅如此,动补结构的出现还改变了汉语的单句结构,使得“数+量”短语由名词宾语之后移到之前,为量词的语法化创造了条件,量词语法范畴的建立又引起名词短语结构的改变,助词“的”的出现就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因为动补结构的这一特殊地位,本书着力最多的是促使它产生的各种因素。本书从句法环境、音韵系统、词语的使用频率和语义相关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探讨了汉语的动补结构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整个发展过程。

除了现象的描写和规律的归纳以外,本书还探讨了一系列普通理论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书中系统地讨论了音韵系统的变化如何影响语法的发展,又详细探讨了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另外还分析了词语的使用频率、搭配能力、语义特点对其语法化的影响。书中通过大量的例子证明,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方面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语法系统更是如此,一个新语法现象的出现就会打破原来系统的平衡,因而会引起一连串的变化,从而达到新的平衡。所以,语法的发展往往不是孤立事件的产生或者消亡,而是在某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现象的背后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语法的发展是遵循着严整的规律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是人类语言语法发展的两个最重要机制,但是两者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本书还详细探讨了它们在汉语语法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特点。

ABSTRACT

This book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its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morphology and syntax of Chinese. It is a grammaticalization approach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s a syntactic pattern consisting of a verb plus an adjective/intransitive verb. Its two elements typically represent a disyllabic unit, stand in an "action-result" relationship, and form a single syntactic constituent. Many important grammatical chang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spect, mood, verb reduplication,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e *ba* construction and the verb copying construction, reached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development or were newly introduced into the language within the period of time from AD 1,000 – AD 1,500. Together these new constructions and categories shaped the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I hypothesize that all of these changes, far being from accidental, are direct or indirect consequence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fluences the grammar of Chinese in two major respects. First, some resultatives, typically those with semantic generality and high relevance to verbs, underwent further grammaticalization into verbal affixes or clitics. Second, due to the fusion of verb and resultative, the patient arguments of the verb which originally appeared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resultative had to appear elsewhere, which triggered the innovation of many constructions. The pres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actors enabl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tendency to disyllabification in the history, a verb

plus resultative pair tends to become fused into a single constituent if it represents a disyllabic unit. Both the timing and the degrees of fusion of verbs and resultatives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by their frequency of collocation, adjacent occurrence, and semantic relevance.

This analysis raises a number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s that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Phonological change can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texture of morphology and syntax of a language through favoring or disfavoring certain pathway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idiomatized or lexicalized items can lead to the innovation of syntactic patterns. The first appearance and expansion of a new grammatical form can be lexically governed. The status of a linguistic form often chang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n old to a new form, which can explain why a new grammatical form which conflicts with an existing rule can come into being. The frequency of collocation and semantic relevance serve as enabling factors for the morphophonological fusion of two constituents. Any grammar is a system and changes typically cluster. Reanalysis is preconditioned and analogy operates in different fashions throughout a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仿古打油诗三首

作者 袁笠翁

石点头

满纸古今言，几行外文例。
都觉说话易，谁解其中理？

寻汉语常道

心注汉语境，正审古今源。
理论与事实，相对亦忘言。
(注：“心注”和“正审”皆为禅宗术语，为“思维修”的两种方式。)

天净沙

语音、词汇、语法，
左看、右看、一家，
抓耳、挠腮、干吗？
问题不大，
经常让你犯傻。

本书所采用的汉语史分期

1. 古代汉语 公元前 900 年 - 公元前 200 年
2. 中古汉语 公元前 200 年 - 公元 900 年
3. 近代汉语 公元 900 年 - 公元 1500 年
4. 现代汉语 公元 1500 年 - 现在

注:行文中间的“古汉语”一词包括“古代汉语”和“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又叫做“早期现代汉语”。

汉语历史上的主要朝代及其时期

西周	公元前 1100 - 771	南北朝	公元 420 - 589
春秋	公元前 770 - 476	隋	公元 581 - 618
战国	公元前 475 - 221	唐	公元 618 - 907
秦	公元前 221 - 207	五代	公元 907 - 960
西汉	公元前 206 - 公元 24	北宋	公元 960 - 1127
东汉	公元 25 - 220	南宋	公元 1127 - 1279
魏	公元 220 - 265	元	公元 1206 - 1368
西晋	公元 265 - 317	明	公元 1368 - 1644
东晋	公元 317 - 420	清	公元 1616 - 1911

主要计算机语料库

1. 台湾中央研究院
2. 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
3. 北京大学中文系

前 言

本书是根据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整理而成的。我很幸运能有机会到这个国际知名学府读书,更幸运的是能有机会师从当今的几位历史语言学大师。其中 Paul Kiparsky 和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对我的影响最深。Kiparsky 是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成员,Traugott 是我的导师。他们两人的背景不同,研究风格形成鲜明对比。Kiparsky 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背景主要是形式语言学派的,他的思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能大处着手,把握人类语言发展的主旋律。Traugott 的兴趣主要是功能语言学派的,她的研究风格细腻、严谨,以小见大,注重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如果说,Kiparsky 是历史语言学领域的“豪放派”,那么 Traugott 应该就是“婉约派”了。他们两个的研究特点实际上体现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语言学派的精神在历史语言学领域的应用。我们认为最理想的是能够把这两种精神结合起来。本书就是体现了作者在汉语历史语言学领域的这种追求。

我在国内的训练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法,这不仅决定了我到美国学习的专业选择,而且也影响了我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思路。国内的语言学界有个优良的传统,注重从语言事实中归纳规律,我的本科和硕士训练都是在国内完成的,深受这一传统的熏陶。但是这种训练既是一种资本,也是一个包袱。说它是一个包袱,主要表现在对注重纯理论思辨的语言学科来说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说它是一种资本,表现在遇到历史语言学这种务实学科时感到特别亲切。我刚到美国时学了大量形式语言学的东西,总觉得隔一层,后来遇到了语法化理论才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我们所学的现

代汉语语法是一个系统,所以会不自觉地把这种系统的观念带到历史句法学的研究之中。本书的思路就是受这种系统思想影响而对汉语历史句法形态所作的探讨。现代汉语语法作为一个系统,与一千年之前的汉语已有重要的差别,那么这些差别是由一个孤立的变化凑合而成的呢,还是系统变化的结果?本书就是尝试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

语言是个系统,不管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研究,我们都应该明确树立系统的观点。这里所说的系统性有几层含义。首先,不同的语法结构或者手段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一个语法系统,任何局部的变动,都会引起相关部分的变化。一种语言的语法总是拥有自己的总体结构特点,它制约着新结构的发展方向,要求新结构与现存的语法系统具有最大的结构相容性,结果新产生的语法手段往往与所在语言的其他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其次,一种语言的句子的基本语序决定这种语言的语法表现形式。汉语自古至今都是SVO语言,这就决定了汉语中的很多语法范畴依赖语序表达,而且该语序也决定了汉语语法化的特点,常常是通过两个或者多个成分的融合来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最后,系统化的观点还指语言的三个构成部分——语音、词汇和语法也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其中一个层面的变化会波及到另外一个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讲,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往往会决定它的语法表现形式。比如印欧语言多允许辅音丛的存在,所以它们可以用一个辅音表示一个语法范畴;汉语则不行,最小的语音单位是一个音节,所以常用一个音节来表示各种语法范畴。语音系统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语法。本书的分析将证明,唐宋时期产生的大量语法标记的源动力都与中古时期的双音化趋势有关。同时,普通词汇的语法化一般不是单纯的词义引申问题,它必须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进行。

简单地说,语法化理论是从语言的内部探求语言演化的规律,

注重探讨普通的词汇或者篇章结构怎么样在特定的句法环境里演化成某种稳固的语法手段。语法化也是一个程度问题,已经语法化的形式又可能进一步虚化为更抽象、使用面更广的标记。同一语法范畴内新产生的不同语法标记,还会常常发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在功能上常常有所调整。而新产生的语法标记又可能与旧有的功能相似的语法手段产生竞争,竞争的结果常常导致旧有形式的消失。语法的发展往往是有规则的、成系统的,新现象的产生往往都有其动因,而且也常常会引起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变化往往从整体上改变一种语言的语法面貌,使它明显有别于前一个时期。

语法化理论是一个朴实、务实的语言学分支。美国的语言学界,学派林立,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拿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系来说,一共有十几位教授,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学派的“领风骚”人物。打个比喻来说明一下语法化理论在美国语言学界的地位。乔姆斯基所领导的形式语言学派及其派生出来的众多语言学分支,就好比时装模特,时髦,风光,五光十色,婀娜多姿,傲视群芳,冷眼看世界,颇为诱人,特别是对那些刚涉世不久的少男少女们。那么语法化理论就好比一个农村姑娘,穿着土气,可能还是母亲甚至奶奶辈的时尚,没有上镜头的机会,即使偶尔上一回,十之八九还是个观众演员,很少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从稳重和生存能力的角度来讲,两者也迥然有别。形式学派也像时装模特,一会儿一套,喜新厌旧,不断翻新,最近推出的“最小化原则(minimalism program)”,像是“穿得最少”原则,给人一种花样变尽的感觉。然而农村姑娘几十年如一日,做饭、种地、带小孩,样样都行,不管是寒风严霜,她们都能轻松地生存下来。从上个世纪法国学者提出“语法化”概念以来,该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一直保留至今,语法发展规律不断地在积累,最近一二十年慢慢发展成一个比较系统、成熟的语言学科。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科学发展的正常现

象。本人选择语法化理论也跟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观点有关——本人个性尚静,不喜欢热闹,而且偏好稳重、朴实、大方的东西。

很多语法问题,只有把历时的和共时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弄清楚。比如关于语法本体的认识上,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认知学派是水火不相容的。形式学派认为语法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系统,不受语义等因素的影响;功能认知阵营的人则认为,每一种语法结构都对应于一种语义结构,语法结构是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结构之间则没有转换的关系。那么从历史上看,真理可能是居于两者之间。不同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演变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是”在秦汉之际由一个指代词演化成一个判断词,首先引起原来判断句式的消亡,又进一步虚化为焦点标记,造成了先秦语序焦点表示法的淘汰。与此同时,“是”完全退化掉了原来的指代用法,这样又使得原来的指代词系统发生了变化,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很多语法变化纯粹是语法系统内部调整的结果。这说明各种语法结构之间的相互密切关系。由此可见,语法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系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语法系统同时也是开放的,它不仅受人们的认知、语义结构、使用频率等的影响,还受语言的其他层面特别是语音系统的影响。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理解语法何以才会发生变化。

东西方语言学在对用例的处理上有不同的习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环境之中写成的,所以在用例的安排上,与我们通行的做法有较大的差别,也跟我自己过去的写作风格很不相同。表面上看来,西方语言学的论著引例比较少,通常一两个即可,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重视理论,不重视事实,用小本钱做大买卖。其实这常常是一个错觉。他们给例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所讨论的语言现象是什么,而不是想向人说明他们有多少事实来支持他们的分析。实际上,在重视语言事实上东西方并没有什么差别。西方也一样有很多语言学派和语言学家是非

常重视对语言事实的调查的,他们的论证和结论也同样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广泛调查分析基础之上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本书在例子的处理上基本是采纳了这种风格。

我们中国语言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优良的传统。重视语言事实的调查和描写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但是在对语言事实的态度上,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它们长期困扰着我们语言学界,甚至有时达到了妨碍我们语言学进步的程度。比如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让事实说话”,“例不十不成律”,等等。更有甚者,一些人谈“事实”和“理论”的关系时,与其说是谈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谈两者之间的对立,而且往往是厚前薄后。这就自觉不自觉地一些人中养成了一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风气,而且也常常以此作为评判别人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其中包含着很多糊涂的观念。如果“事实”会自己“说话”的话,还要我们研究者干什么呢?事实上,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例子,必然受自己的理论背景、研究目的等方面的影响。同样的现象对有些人是事实,对别人可能是视而不见的东西,其原因可能是人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观察敏锐力有高下之分,理论追求有别,等等。而且,同样的事实,对于不同的人,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资料价值。任何科学规律都必须靠人们的艰苦探索才能得到。现代科学有许许多多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它们绝大部分是最近几百年才被科学家们发现的,但是它们作用的历史跟自然界的寿命应该是一样长的。同样,语言现象自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其背后的规律,它们的发现和自觉运用也必须依赖我们语言学工作者的努力。“例不十不成律”这句话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推理”。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罗列的例子越多,结论就会越可靠。其实,对于不完全归纳推理来说,不论罗列例子有多少,结论都是或然的。根据2个例子所得出的结论和根据10个例子或者更多的例子所得出的结论,可靠性是一样的,都可以是正确的,也都可以是错误的。只

有找到了现象和规则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时,结论才有可能完全可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风气曾在汉语学界相当流行。翻一下汉语研究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汉语史方面的,相当大的篇幅都是用于例子的罗列,有些同样一种例子,一列就是几十个。打个比喻,这就好比盲目地烧砖块和伐木头,辛苦是够辛苦的,看到琳琅满目的材料,也颇有一种成就感。时间久了,就养成一种习惯,觉得只有这样做心里才踏实,同时也看不惯别人的不同做法。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那种砖块和木头都裸露在外的房子才实在、才可以遮风雨。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如何用手头的材料使得盖成的房子不仅可以遮风雨,而且也可以使人觉得舒适、美观。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还有别的材料也可以盖房子。大家更应该一起努力,筑起汉语语言学的辉煌殿堂。

在汉语学界,人们对“理论”二字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指某种学派所提倡的理论学说和概念系统,通常是指西方语言学界所提出的;二是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机制等。很多人在谈理论时经常指前一种。我们当然不赞成那种在别人的理论体系里兜圈子,抓住汉语的一鳞半爪来诠释别人的理论的做法,因为其结果常常是扭曲了汉语自身的规律。但是,如果把“理论”看作是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这是汉语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最终研究目的,是我们每一个语言学者的责任。当然,学者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分工,一些人可以侧重于对事实的调查和整理,一些人则着重于对规律的探求。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同时学会两种本领,会亲自调查资料,又善于总结规律。

我们在《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中,曾经把整个汉语语法发展史比作一部交响乐。这部交响乐是有很多乐章构成的。对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形成具有最重要关系的这个乐章的序曲就是动朴

结构的形成,它自然带出汉语语法在宋元时期发展的一个高潮。本书的重点是这个“序曲”的演进过程,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领略整个乐章的壮美,我们把高潮中的几个重要变化放在本书的附录中。附录中的内容大都已见于《历程》一书。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对于尚未看过《历程》一书的读者,他们可以有机会欣赏到一曲完整的乐章;对于已经看过《历程》一书的读者,他们可以由此明白两本书之间的自然衔接之处。这两本书代表我们长期以来对汉语语法演化史的整体思考的阶段性成果,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论文指导委员会老师的悉心指导。Kiparsky 教授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良好的建议。Saussy 教授不仅给予了具体的指导,而且身兼系主任,提供了许多行政管理上的帮助,使得论文的写作更加顺利。孙朝奋老师跟我讨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资料,对论文的改善具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从多方面帮助我的学习。我认为自己是少数有幸能有机会跟 Traugott 教授学习的人。她是对我博士论文写作倾注心血最多、帮助最大的一位老师。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 Traugott 教授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她在语法化理论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我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组织框架,她那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思维、具有洞察力的建议是我写作过程中灵感的来源,也是我沿着这条路子继续研究下去的永恒动力。

在美国我还受教于其他很多教授,他们都对我的学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要感谢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系的王靖宇教授,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令人尊敬的长者,我跟他修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文学方面的课程,对我研究汉语历史具有直接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李讷教授,他可以说是把我引入历史句法、形态学的启蒙老师。他与 Sandra Thompson 教授一道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对汉语语法化研究做了很

多开创性的工作,最近主导了一个大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邀请我长期担任该项目的研究成员。他所提供的良好的研究条件,特别是他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使得我能有机会系统地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学。我的博士论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参加这项工作所打下的基础。此外,我还特别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 Sandra Thompson 教授和圣地亚哥校区的 Ronald Langacker 教授,从他们那里我分别系统学习了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总结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非常有帮助。

应该特别感谢王葆华师兄。他不仅帮助校对出参考文献中的一些疏漏,而且还阅读了部分内容,提出一些良好的建议,使得本书的最后形式更适宜于人们的阅读习惯。

根据我的博士论文整理而成的英文专著已经于 2002 年 2 月在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出版公司出版。考虑到广大中国读者的需要,征得该出版公司的同意,又把它改写成中文出版。非常感谢 Benjamins 公司概允使用英文著作中的资料和分析。这个中文本并不是英文本的简单翻译,而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习惯,在术语、表述以及结构上做了很多变动,同时在篇幅上也扩大了许多。

最后,还应该特别感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其他同仁,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这本书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与读者见面。

石 毓 智

2002 年 5 月 6 日于新加坡国立大学